

● 翻译研究: 译者主体性专题

#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sup>\*</sup>

## ——兼论“译者中心”面临的质疑

罗迪江

(广西科技大学, 柳州 545006)

**提 要:** 经过多年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外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它是话语实践中的一次创新尝试。本文通过对当代生态翻译学中“译者中心”思想的合理解读,使它的客观意旨得到诠释:赋予译者独特的位置、建构辩证互补的翻译观及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译者中心”思想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译者中心; 客观意旨; 以人为本; 译者责任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9)01-0092-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9.01.015

### On the Objective Purpose of “Translator Centered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Rethinking the Criticism Against “Translator Centeredness”

Luo Di-jia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Eco-translatology has gott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a new practice of academic discursal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or centeredness”, the idea of “translator centeredness” of Eco-translatology has been reinforced. The objective purpose of “translator centeredness” can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endowing the translator a unique position, constructing a dialectical and complementary translating view as well as returning to the idea of “human-orientedness”. This research proves in some ways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nslator-centeredness”, and expands the horiz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or centeredness; objective purpose; human-orientedness;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 1 引言

经过 15 年的发展历程之后,生态翻译学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在国内翻译界产生重大影响,逐渐显示出理性与成熟的趋势(陈圣白 2017: 6)。近年来,“译者中心”作为当代生态翻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由于“译者中心”明确地拒斥“原文中心”

与“译文中心”长期以来侧重“文”而忽视“人”的研究方法,所以给传统翻译研究的可接受性带来较大的挑战,被坚持反“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的翻译学者所接受。“译者中心”坚持的理念是与“原文中心”“译文中心”实现和谐共存,使“原文—译者—译文”构成一个三者合一、辩证互补的共同体。但同时,“译者中心”思想也成为很多学者对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18BY022)和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科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机制研究”(JGY20170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 dijiangluo@163.com

生态翻译学进行质疑与批评的焦点之一。我们认为,系统地阐释“译者中心”的基本内涵与客观意旨对于加强“译者中心”思想、回应它所面临的质疑与批评及确立与巩固“译者中心”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 2 “译者中心”的基本内涵

当生态翻译学对“原文/译文中心”理念做出根本意义上的批判或扬弃时,“译者中心”的思想便登上翻译研究的历史舞台,它试图重新定位当代翻译研究的走向和基点,并使自身成为一种影响翻译研究发展的特定人文途径。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中,“译者中心”的取向是“翻译过程”“翻译操作”或者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活动(胡庚申 2013: 208)。“译者中心”在本质上要求翻译要“回归译者”,充分发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与中心地位;而“回归译者”的意旨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翻译研究只见“文”不见“人”的偏颇,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找到真正的“家园”。

“译者中心”的基本内涵是由“译者主导”“译者责任”与“译者发展”构成的一个三者合一、辩证互补的思想体系。“译者中心”在翻译层面上指译者主导:主要是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即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等翻译活动中的一切翻译行为都由译者判断和决定;“译者中心”在翻译伦理层面上是译者责任:主要指译者有责任协调各方关系、践行生态理念、保持生态平衡与维护生态和谐。“译者中心”在价值论层面上指译者发展:一方面,译者要适应与构建翻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译者要改变自身的翻译生存境遇,提升翻译能力,从而获得选择的自由以确实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此为基础,生态翻译学通过“译者中心”确立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作用、责任意识与主体发展,从而使翻译研究回归译者与尊重译者。

“译者中心”是总结“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经验教训后的一种改进,是对只见“文”不见“人”偏颇译论的一种修正;同时,“译者中心”相对于“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是一种“解构”与“平衡”(胡庚申 2013: 214-217)。这使“译者中心”以其鲜明的观点和回归译者的姿态而具有独特的影响力,但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与批评。一种质疑是将“译者中心”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译者中心”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无法尊重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正当地位;另一种质疑宣称,须要解构“译者中心”才能建构生态

翻译学,认为“译者中心”违背生态伦理价值,无法赋予原文、译文、翻译群落其他成员平等的内在价值。对此,我们将通过阐明“译者中心”所蕴含的客观意旨来回应质疑。

## 3 “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

“译者中心”的根本宗旨是消解传统翻译研究因围绕原文与译文取向而存在的只见“文”不见“人”的偏颇,确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与中心地位,同时捍卫“译者中心”在当代翻译研究中的地位。综观生态翻译学的思想本文认为,“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是赋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独特的位置、建构辩证互补的翻译观及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试图与原文中心、译文中心构成一个三元合一的和谐共同体。

### 3.1 赋予译者独特的位置

在“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所构成的二元结构里,译者被追求“信、达、雅”的原文和译文所遮蔽,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以“文”治“人”的偏颇,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无法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沦为“仆人”,译者只好戴着“枷锁”跳舞。“译者中心”意识到“原文中心”“译文中心”偏重于“文”而忽视“人”的局限性,把对翻译本质的追寻置于译者的翻译活动实践中,强调只有在译者的参与下,原文与译文才能搭起沟通的桥梁,实现翻译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译者的中心地位由自身独特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决定,它是沟通“译前”“译中”与“译后”之间的枢纽,负责平衡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隔离状态,维持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和谐统一;译者的主导作用在于“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同上: 232)。这样,原文—译者—译文的内在关系就犹如“语义三角”一样拥有更大的稳定性、和谐性与平衡性,它们既各自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译前”“译中”“译后”之间的和谐统一与翻译活动的生态平衡。如果没有原文,翻译将失去存在的根源;如果没有译文,译者就不可能存在,也无法找到翻译存在的家园;如果没有译者,整个翻译将失去意义,原文与译文之间将没有积极参与和推动翻译实践活动的主体。由此看来,原文与译文是译者存在的根本,这种存在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译者不仅被翻译活动赋予具有主导作用的翻译能力,将译前、译中、

译后内在地联系起来并建构一种稳定的翻译生态系统,而且还被赋予协调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关系、履行生态理念、保持生态平衡与维护生态和谐的特殊使命。

“译者中心”并不是使三者简化为任何一种或两种,而是承认原文、译文在翻译过程中拥有各自的适当位置,同时赋予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一种特殊的地位:译者是翻译群落中的一名成员,地位与群落中其他成员的并不完全相等。在此,译者有两个层面的内涵:首先,译者是拥有改变自身的生存境遇与提升自己的翻译能力的人,是翻译群落的代表;其次,译者与原文、译文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译者既是能动的、创造性的人,又是受动的、受限制的人。这就是说,一方面,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改变翻译的生存境遇,建构和谐平衡的原文与译文生态,实现自己的“译有所为”,这是译者的能动性表现;另一方面,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译者又受限于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既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改造与重构翻译生态环境,尽量保持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的协调与平衡。作为原文、译文的积极参与者与主要推动力,译者主导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承担维护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和谐平衡的责任。基于对译者独特位置的解读我们发现,“译者中心”不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它指向非“人类中心主义”,译者与原文、译文一起组成翻译活动的和谐共同体。这既有效地回应关于“生态意识下的译者不应作为‘中心’,而应成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普通成员,和环境中的其他成员进行平等对话”的观点,也有力地回应关于“译者中心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生态伦理相悖”的观点。可以说,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或生态意识来质疑“译者中心”所赋予译者的独特位置,进而消解“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的想法不会奏效。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引出的关于“译者中心”相悖于生态伦理的批评很难成为结论性的判定,同时也无法深刻地揭示“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

### 3.2 建构辩证互补的翻译观

面对原文中心、译文中心在翻译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困境,生态翻译学另辟蹊径,寻求介于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的一种中间战略——“译者中心”。就翻译的存在状况而言,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是处于对立的、二分的状态,从而使翻译研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两者无法从对方的中心论中剥离开来,以澄明各自的认识论。为了消解

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二分对立的状态与两难境地,一方面须要有独特的融合能力,使两者在翻译研究趋向上均有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另一方面须要有特别的牵引能力,使两者在翻译研究中消解彼此之间的隔离状态而共存和互补,这个有融合能力与牵引能力的就是有能动性、主体性的译者。当“译者中心”思想提出时,译者是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的牵引者与融合者,消解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的对立状态,形成扬长克短与扬长补短的态势,从而具有辩证互补的整体发展趋向,实现译者中心与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的融合与贯通。“译者中心”与“原文中心”“译文中心”之间的“三元结构”犹如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队,各司其责,又以译者为轴心形成一股力,共同实现翻译生态的和谐平衡,克服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结构或二元对立的缺陷而得到整体上的辩证互补。换言之,“译者中心”所要消解的不是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各自走向的内在特性,而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分离状态。“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不仅求解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要从理论与实践上消解译者与原文、译文之间的对立状态,消解译者中心、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之间的分离格局,追求翻译的多元互补性与辩证统一性,建构一个三元合一、辩证互补的和谐共同体。简言之,“译者中心”第二个层面的客观意旨是建构一个辩证互补的翻译观,既能让译者中心、原文中心、译文中心各自拥有存在的地位和功能,又能给三者的发展提供共生共存的平台。

基于辩证互补的翻译观,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在译者中心的介入下,通过译者的主导作用破除译者与原文、译者与译文、原文与译文之间的隔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彼此之间的和谐统一与生态平衡。换言之,“译者中心”既是对传统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二分状态的消解和超越,又是对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两极状态的解构与平衡,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中一个辩证互补的翻译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中心”并没有陷入原文中心、译文中心存在的偏颇,这有效地回应“既然意识到原文中心或译文中心存在偏颇,为什么就没有意识到强调译者中心也会存在偏颇?”的观点(王宏 2011:10)。进一步说,“译者中心”首先要消除译者在翻译实践与生存方式中的主(译者)客(原文或译文)二元对立。在原文中心或译文中心的理念下,译者因为唯“文”是瞻而在翻译过程中丧失自己存在的家园,丧失自己应该拥有的主导作用与中心地位。其次,“译者中心”的核心

是原文—译者—译文建构而成的“3元互补”的辩证观,它通过对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的反思,将译者与原文、译文统一起来。可以说,“译者中心”是基于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研究的不足而提出的富有超越性的翻译理念,它反对简单地将译者与原文、译文对立起来,而是将译者看成与原文、译文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体。可见,翻译活动是译者的主导作用与原文生态和译文生态和谐统一的动态生成过程。

### 3.3 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

长期以来,传统翻译研究围绕“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不断地追问翻译之“本”,它避开译者和译者的翻译生态,与能改变翻译生存境遇并有创造性的译者格格不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不满足于沦为翻译的“仆人”,也不满足于既定的翻译生存境遇,他须要不断地适应与建构理想的翻译生态环境以追寻翻译之“本”。“译者中心”第三个层面的客观意旨是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回归翻译的人文关怀精神,回归译者的真正“家园”。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对于“译者中心”思想来说就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翻译理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困境,使原文、译文不再与译者处于对立的状态,译者成为原文与译文的看护人与守望者。

从本体论上看,“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是把对翻译本质的追问回归到译者及其翻译实践中。因此,译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之“本”,是栖居于翻译存在之中的主体,是居住于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最终在翻译存在与翻译活动中成为翻译生态的守护者与看家者。翻译实践是译者的实践,没有译者就无所谓翻译实践;离开译者的实践,翻译生态难以实现和谐平衡。翻译存在是译者的存在,没有译者也就没有翻译存在;如忽视译者的存在,翻译生态的图景便难以摆脱片面性与单一性(罗迪江 盛洁 2017)。对于翻译实践,译者是翻译之本;而对于译者,翻译活动是本。翻译活动是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是翻译实践的主体,“作为人类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翻译活动涉及理解、记忆、决策、推理、问题解决、思维、表达和创造性等要素。这些要素是属于智力范畴的认知能力,毋庸置疑,译者这些认知能力的强弱与翻译质量有紧密的关联”(谢柯 张晓 2017:99)。没有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译者,也就不会有上乘的翻译作品。在翻译领域,“译者中心”思想是一次创造性的突破:它不仅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进行内在性的关联并

与它们构成一个“3元合一”的和谐共同体,第一次真正置译者于“本”的地位,而且把对译者的理解建立在动态的翻译实践基础上。“译者中心”置译者于“本”的客观意旨有效地回应了关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以人为本’强调人人平等,强调翻译应关注翻译活动实施过程中所有的人”的观点(张其海 2016:83)。

从价值论看,“译者中心”要求译者内在性的发展,而译者发展是“译者中心”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换言之,“译者中心”的落脚点与归宿必须是译者的发展,以此来提升译者的翻译能力。胡庚申指出,译者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把翻译做好,做好翻译的基础是译者的翻译能力,即成功的翻译取决于译者的能力,而译者的能力有赖于译者的发展,译者的发展又建基于译者的生存(胡庚申 2013:211)。在这个意义上,译者能力的提升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而“译者中心”本质上就是不断地在翻译实践中推动译者的发展,确定译者的主导作用与中心地位。译者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改变自身的翻译生存境遇,才能建构适应自身的翻译生态环境,才能提升自己的翻译能力与责任意识,才能挖掘自身的潜能,最终走向译者的全面发展之路。可以说,“译者中心”思想有更丰富的内涵,在更深广的维度上保障译者的生存与发展,规范译者的责任意识,建构译者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译者之所以为译者的“家园”(罗迪江 胡庚申 2017)。

总而言之,“译者中心”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是一种回归人文关怀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回归既把译者置于翻译之“本”,又能增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一方面促使译者的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又改变译者的翻译生存境遇,提升译者的翻译能力,从而得到成功的翻译。将译者置于翻译之“本”体现出“译者中心”既是人本论思想的不断演化与拓展,也是对译者主体性思想的超越。可以说,“译者中心”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既是“译者中心”内蕴的客观意旨,也是“译者中心”发展趋向的内在要求。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第一,“译者中心”思想是多层次的,是“译者主导”“译者责任”与“译者发展”的统一体。第二,“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是赋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独特的位置,建构辩证互补的翻译观,回归“以人为本”的翻译理念;第三,批评者

对“译者中心”的解读是表面的、不深刻的,并没有切入到“译者中心”的客观意旨与核心内容,误解“以人为本”之“本”的内涵,从而把“译者中心”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等概念混为一谈。当然,由于这些质疑是建立在生态翻译学原创性的基础上,目的是促进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使“译者中心”思想更加完善,因此它们也能从反面彰显“译者中心”的原创性与影响力。第四,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理念在质疑与批评中得到坚实的辩护与捍卫,因此它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其思想体系是合理的,是成立的。可以说,“译者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原文中心”或“译文中心”固执于原文或译文的迷思,同时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不足,将译者置于翻译过程中的首要位置,与“原文中心”“译文中心”构成一个三者互补、辩证统一的和谐共同体,从而使翻译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最终成为当代翻译理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生态译学的理论构建实际上是中国译学话语实践中的一次创新尝试。对生态译学话语进行批判性研究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生态译学知识体系现阶段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局限性,从而有利于其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实践的深化,而且同时还能为中国当代译学话语乃至人文社科学术话语的整体构建提供方法上的思考。”(刘润泽 魏向清 2017: 74)

#### 参考文献

陈圣白. 中国生态翻译学十五年文献计量研究[J]. 上海翻译, 2017(5). || Chen, S.-B.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Fifteen-year Development of Eco-translatology in China[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7(5).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诠释与建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Hu, G.-S. *Eco-translatology: Construction & Interpretation*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刘润泽 魏向清. 生态译学话语构建的术语批评路径及其反思[J]. 外语学刊, 2017(3). || Liu, R.-Z., Wei, X.-Q. Terminologie-critiq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 As Exemplified by Eco-translatology in It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coursal Dissemination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7(3).

罗迪江 胡庚申. 关于生态翻译学相关问题的再思考——对尹穗琼商榷文章的回应[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3). || Luo, D.-J., Hu, G.-S. On the Rethinking of the Relevant Issues of Eco-translatology: A Respond to Yin Suiqiong's Article [J].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17(3).

罗迪江 盛洁. 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思想分析及其本体论立场[J]. 外语教育研究, 2017(1). || Luo, D.-J., Sheng, J. An Analysis of Hu Gengshen's Thoughts on Eco-translatology and its Ontological Stance [J].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 2017(1).

王宏. 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J]. 上海翻译, 2011(4). || Wang, H. Reflection on the Core Thoughts of Eco-translatology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11(4).

谢柯 张晓. 情绪智力与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方向[J]. 外语学刊, 2017(5). || Xie, K., Zhang, X.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 New Direction [J].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17(5).

张其海. 生态翻译学之思辨[J]. 外文研究, 2016(1). || Zhang, Q.-H. Reflection on Eco-translatology [J]. *Foreign Studies*, 2016(1).

定稿日期: 2018-11-27

【责任编辑 王松鹤】